

复旦人·战疫故事

“心中分量最重的其实永远都是患者和学生”



张继明

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、教授

2月3日出征任务确定,1小时救援队组队完毕,2月4日出发,当天晚上到达武汉。这支救援队,正是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,也被称为华山“三纵队”。

出发前夕,当华山医院感染科副主任、教授张继明知道自己第二天就要作为队长带着整个救援队上前线“打硬仗”的时候,第一反应是:压力很大。转念一想:确实应该我去。这个张文宏口中的“张妈”是华山感染另一灵魂人物,对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狡诈的“敌人”,张继明当仁不让。

在驰援的武昌方舱医院,华山“三纵队”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其他医疗队共同奋战,实现了病人零病亡、零回头,医护零感染,为提高治愈率、有效降低死亡率交出了一份闪亮的答卷。武昌方舱休舱后,包括张继明在内的26名队员继续转战武汉同济医院光谷院区ICU,与华山医院的战友们会师,收最重的病人,打最硬的仗。

出征之时,张继明的发言只有简短一句话,却铿锵有力:不辱使命,带着所有人平安归来。

凯旋之时,张继明感慨满满,这位从医36年的医学“老兵”,见过无数生死时刻,但武汉前线的点点滴滴还是让他数次落泪。

最大危险是不知危险在何处

从武汉回沪,在前线瘦了十多斤的张继明终于开始慢慢恢复体重。张继明感慨:终于睡了一个好觉。采访在隔离休整期间进行,话题自然从张继明回沪后的状态谈起,言语之间,张继明最为牵挂的还是患者和学生,他说,很多患者等着自己开诊,他的几个学生,目前课题进展如何,他都如数家珍。在他心上,分量最重的永远是患者和学生。

Q 能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初到武汉时的感受吗?

● 张继明:出征的时候,有一

个强烈的感觉是我们要去的是一个未知的战场。刚到武汉那晚,我们直到了下火车,还对接下来要去哪里一无所知。后来,我们被接到了一个体育馆,才知道这就是方舱医院,就是我们后来奋战的地方。

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就像战场前线,我在这里感受到了最前线的紧张气氛。2月5日当天晚上11点,我们就开始接收病人了,到第二天上午一共500名病人入院,这个强度是之前从未经历过的。很多人问我,前线最大的危险是什么,其实,最大的危险就是不知道危险在哪儿。

当时方舱医院组建仓促,物资匮乏,条件极其简陋,院感流程还在形成过程中,身边的每个环节都有可能存在风险。但我们必须冲在前头,还得保证自己不被感染。我负责整个医院的院感管理工作,我的任务就是出征时我承诺的那样,要做到医护人员零感染,应该说面临的压力不小。后来,我们通过严格的院感流程,实现了这个目标。

Q 进驻方舱医院后,一开始医疗队遇到了哪些困难?又是怎样克服的呢?

● 张继明:最初方舱医院条件确实比较艰苦。当时方舱医院里很多东西都没有。一开始都没有大的垃圾桶及垃圾袋,要拖地找不到拖把,要消毒地面却没有消毒片,体育馆无污水处理系统,需要收集病人的洗脸水、漱口水,却没有水桶等物资。我的一个在取博士生王燕(华山医院老年科医生)自己想办法,通过各种渠道,买到了拖把等物资。后来,在政府和全社会的通力协作之下,医院内设施物资不完备问题基本得到解决。

此外,医护人员如何与患者建立信任感也是一个问题。在抗疫前线,医生穿着厚重的防护服,每几个小时换一次班,和患者的交流不太稳定,加上一开始

一些患者存在悲伤、焦虑、急躁、恐慌等负面情绪,医患之间的信任感和沟通会比平时更为困难。

后来,在武昌方舱医院,我们成立了临时党委,在舱内成立病人临时支部,让病人和医务人员一起参与舱内病友管理,通过党组织的力量做一些思想工作,稳定情绪、消除恐慌。同时,我们在前线推行一套我们称为“话”疗的治疗方法,除了药物治疗之外,平时医护人员还通过和患者聊天交流,为情绪低落的患者提供安慰和鼓励,事实证明在患者病情改善方面还是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,医疗队以及政府部门之间衔接顺畅,患者治疗情况也趋于平稳。大家可以从媒体上看到方舱医院内的一些场景令人振奋:在医护人员带领下,患者们可量力而行,随着音乐节拍跳起广场舞、健身操,活力满满,促进身体更好更快地康复。除此之外,这样做有助于和患者建立良好的沟通,稳定患者情绪,还可发现病情重一些的患者,以便作为重点监护对象,减少转为重症的比例,降低病死率。

疫情面前别无选择唯有逆行

武昌方舱医院从2月5日开始收治病人,运行了35天后宣布休舱。35天的时间里,武昌方舱医院渐入佳境,创造了一系列“最”:最早投入使用、最早成立临时党委和病人临时支部、最早有患者出院、最早开始进行病人心理疏导、最晚一个休舱。其中,在运行6天后的2月11日,首批28名患者痊愈出院,极大提振了全社会抗击疫情的士气,也很好稳定了患者的情绪。

Q 您在前线经常是十几个小时连轴转,最辛苦的时候支撑您坚持下去的信念是什么?

● 张继明:我觉得主要还是职业精神驱动。疫情面前,别无选择,必须要站出来,必须要上,这就是医护人员的职业精神。

此外就是前线氛围的感召,我们刚到武汉时,平日里繁华热闹的街上几十公里内都看不到人和车,商店都紧闭大门,街上安静得让人感到压抑。这些都给人一种身处前线的感觉,会推动你必须要去做些什么改变这个状况。

当然,我们在前线也感受到很多来自后方的关怀,市卫健委、复旦大学、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、华山医院等方面都提供了很好的支持和保障,为我们免除后顾之忧,也让我们感觉,在武汉前线,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Q 您和您的团队坚守在前线的一个多月里,一定有不少记忆深刻的人和事,能和我们分享一下吗?

● 张继明:其实在前线,还有很多武汉的基层干部和社区工作人员,他们的贡献也非常大。医护人员在方舱医院的工作,是联防联控的其中一环,还有更大范围的工作是政府、社区在做。在战疫最艰难的时候,几乎我接触到的每个基层干部和工作人员都哭过。他们往往把最好的食物留给病人、援鄂医疗队员,他们自己其实都没什么吃的。医院内的方方面面细节,比如说医院里门坏了,穿防护服的地方需要镜子等,这些都是由政府相关部门去协调解决的,他们真的很难不容易,也付出了很多。

高高在上做不了一个好医生

在前线奋力抗疫的同时,张继明也没有忘记他的学生们。2月26日,一堂面向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6级临床八年制专业本科生的“传染病学”课程在“云端”开讲。身在方舱医院的授课教师张继明仍坚持准时上线为学生答疑解惑,为同学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。

Q 如今,您作为医学生和青年医生的前辈,向他们传道授业解惑。您在方舱医院的时候仍坚持给学生上课,您说“就算再忙,也不能耽误学生的答疑!”可见学生在您心中的分量,您对后辈有怎样的要求和期望?

● 张继明:与大多数上海医学院毕业的同行比,我的起点是比较低的,我考入上医之日起即意识到这点,也暗暗下定决心,要经受起寂寞,笨鸟先飞,做一个不遗余力的追赶者,尽最大努力,做出优异成绩,回馈我最热爱の上医和华山医院。

我经常对学生讲的话就是,英雄不问出处,我不看你的起点,你的出身如何,关键在于你的持续付出和踏实努力。作为上医人、复旦人,要承担更多的责任,对自己有更高的要求,这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

当然,作为医生而言,还要学会和病人更好地进行交流沟通,这次前线抗疫的经历更让大家认识到医学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。我自从有手机开始,都会把手机号留给病人,我的手机通讯录里现在有几个千个联系人,很多都是我的病人。不少人问我为什么要这么做,我觉得这是医患之间建立信任的一个做法。对于大多数病人而言,他们没有

特别的事一般不会来打扰医生,但有需要的时候,哪怕医生说上几句宽慰的话,对病人来说都是一种鼓励,一种希望。作为医生,我最怕的不是病人得了疑难杂症,而是他对你产生不信任,进而放弃治疗。

医生的培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学医是一辈子的事,除了医术层面,更有人文关怀层面的培养,也就是上医倡导的“为人群服务”的理念,要仔细体察患者的需求,与患者交心。有一次,我的学生负责的一个患者要转院,他是从外地前来求医,家属不在身边,自己又不会使用打车软件叫车。于是,我请学生帮助病人叫好了车。我对学生说,让他自己到外面去扬招出租车,万一很无力摔倒了,出事了怎么办?很多在你看来很容易的事情,对于病人来说,可能就是天大的困难。

所以,做医生如果不投入进去,浮在表面,高高在上,是做不了一个好医生的。要理解你的病人,就是把他当成亲人。同样,你也会从这个过程中得到回馈。

Q 近年来,您发表了不少科研成果。作为临床医生,您是如何做到临床和科研两手抓的呢?

● 张继明:在知名大学的附属医院,光会看病是不行的,还要会做科研,也就是近年来所说的研究型医生。在1999年前后,我明显感觉到自己科研能力的不足,需要充电,否则会跟不上时代。由此我产生了到先进实验室进修学习的想法。当我把这种想法向翁心华主任汇报后,他非常支持我。他一直有着前瞻性的眼光,对我说流行性出血热患者逐年减少,要把研究方向转到我国的常见病病毒性肝炎,尤其是乙型肝炎上。在这个领域,上海医学院的基础研究也是处于全国前列的,他亲自带着我去找闻玉梅院士,闻院士马上安排瞿涤教授具体指导我,从事鸭肝炎病毒感染模型和苦参素抗病毒作用的研究。

闻玉梅院士、瞿涤教授和何礼芳教授是我在乙肝基础研究方面的领路人,这段科研经历使我终身受益。这些年来,闻院士一直强调临床与基础的结合,她对我的鼓励也一直在激励我在科研的道路上前进。不论身在何地,任何时候,我一直把自己当成医学分子病毒实验室中的一员,袁正宏、谢幼华、童舒平、王宾、李建华、邓强等多位教授在乙肝研究方面给予了我巨大的帮助,至今与他们的课题组仍有密切、良好的合作关系。

文 / 齐臻熹 张欣驰